我听到了一对情侣的争吵

《如此苍白的心》[西班牙]哈维尔·马里亚斯 著 周钦 缪澄君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23年2月

最先传入我耳朵里的是一个恼怒的声音。像是某个人说了无数遍的事情，另一人每次听到都不相信、不理解和不接受。那是一种削弱的、惯例性的恼怒，所以那个声音没有喊叫，而是小声嘀咕。是那个男人的声音：

“我跟你说了我老婆快死了。”

米莉亚姆听罢马上予以回击，同样气急败坏。我立即修正了自己的看法：恼怒不是来自一个人，而应该是这两人的家常便饭，至少他们在一起时是这样。她的一连串话加上男人的头一句形成了一组对白，我突然可以毫不费力地听清了。

“但她没有死。她要死但一年了还没有死掉。你干脆杀了她，你必须带我离开这里。”

接下来是一阵沉寂。我不知道男人是沉默了，还是把声音再放低了些，来回应米莉亚姆的要求。这要求也许她不常提起。

“你要怎么样？难道要我用枕头把她闷死吗？我做得已经足够了。我撒手不管让她等死，这等于把她往死里送。医生开的药我没有都给她，我不理她，冷落她，让她受气，让她起疑心。我把她最后一点儿求生的欲望都剥夺了。你觉得还不够吗？现在再冒险瞎行动没有意义，离婚也没有意义，这会让事情至少再多拖延一年。相反，她随时都会死，有可能她今天就会死。难道你不知道，这部电话随时都会响起，通知我她的死讯吗？”那男人停顿了一下，接着口气有所变化，好像有些迟疑，又似乎在不由自主地微微发笑，“说不定她这会儿已经死了。你别犯傻了，要有耐心。”

这女子有着加勒比口音，想必是古巴人，虽然我基本上还是根据我祖母的口音做此推断（因为古巴人不常参加国际会议），而她早在一八九八年就跟随所有的家人一起离开了古巴，那时她还很小。祖母回忆童年时说，古巴岛上的口音非常不同，比如她能区别奥连特省人、哈瓦那省人和马坦萨斯省人的口音。然而那男人跟我一样，操着一口地道的西班牙本土的西班牙语，确切来说是马德里地区的口音，字正腔圆，早年电影配音演员的那种，我也还保留着这样的口音。两人上边的这番对话是老调重弹，可能只是细节跟以前有些出入，他们肯定重复过上千次，但是对我来讲倒是全新的。

“我不是没有耐心，我一直在等，可她没有死啊。你给她气受，却不跟她提起我，这部电话也从来没响过。我怎么知道她快要死了呢？我怎么知道这一切不是骗人的鬼话？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也没去过西班牙，连你到底有没有结婚都不清楚，没准这就是你设置的一场骗局。有时候我感觉你老婆根本不存在。”

“好了好了，那我的结婚证明怎么解释？还有那些照片？”男人说道。他的口音跟我相似但嗓音差别很大。我嗓音低沉，他的尖细，小声嘀咕时几乎有点儿像在尖叫。这声音不像属于一个汗毛浓重的男人，倒像出自一个弱不禁风的歌手，说话时唯恐嗓子受损，绝对不会花力气变换一下自己那种天生或矫饰过的音色。他的声音听着像拉锯。

“我哪儿知道那些照片是怎么回事！也许是你妹妹的，可以是任何一个人的，你情人的，谁知道你有没有另一个情人。别跟我说结婚证明的事。我已经不相信你了。你老婆要死不死的都快一年了，赶紧死掉吧，要么你也别再来烦我。”

他们的谈话内容大抵如此，我能回忆起来、转写下来的就是这些。当时路易莎似乎还在昏睡。我坐在床尾，双脚搁在地上，背部挺直，不倚不靠，身体紧绷，生怕弄出声响来（包括床的弹簧、我的呼吸和身上穿的衣服）。我看着墙上镜子里的自己，也就是说，如果我想的话还是能够看得见自己的，只是当一个人听得太入神，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就好像某个感官发挥到极致就会排斥其他官能。如果要看的话，我还能从镜子里瞧见身后的路易莎蜷缩在被单下的身形起伏，确切地讲是身体的部分轮廓，因为她躺着，我在这面半身镜中只能看见这些，要再想看到她的脑袋，我就必须把身体再立直些。米莉亚姆说完最后一句话，我似乎听见（不过也可能是此时我有了想象的空间，可以想象没有看到的画面和并没有听到的声音）她愤怒地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转了一两圈，当然她房间的格局跟我们的一模一样（她似乎想一走了之但是做不到，她在等待，等着自己的怒气消散）。我听到脚踩木地板引发的咯吱声，如果是这样的话，她确确实实是光着脚的，因为那不是鞋底而是脚后跟和脚指头踩地的声音。谁知道呢，没准她此刻赤身裸体，没准在我没有听到任何响声时他们脱掉了衣服，已经开始亲热，而后中途停下，带着两人一贯特有的恼怒争执起来。我想，这是一对倚赖于阻碍而存在的情侣，阻碍消除时他们便会散伙：倘若这漫漫无期、令人煎熬的阻碍没有先拆散他们，倘若他们此刻已经是难舍难分，他们就要维护它、滋养它，设法让它永恒。

“你真的想让我不再来烦你了吗？”

没有听见对方回应，或者男人等不及她回应，就用更坚决的语气，用刺耳的拉锯般的声音，小声嘀咕道：

“说啊，那就是你想要的？以后我每次来都不要再给你打电话了吗？你不想知道我来了，就在这里，也不想知道我什么时候来的？你想要连续几个月都找不着我，见不着我，不过问我的事，我老婆死了你也不想知道了吗？”

男人应该也站起来了（不知是从床上还是从扶手椅上起身）。他走近米莉亚姆站的地方。她也许没有光着身子，只是脱了鞋。即便天气很热，也没有人会赤条条地在房间中央待上片刻，除非是经过那里去浴室或到冰箱取东西。当时天气确实非常热。男人的声音继续响着，语气更为平静，或许正因为平静了下来，他也不再小声嘀咕了。他总是提着嗓子说话，像个歌手，连争吵都要权衡克制；正常发声，他的嗓音同样尖细，总之声音震颤，像神甫在讲经布道，或者威尼斯贡多拉上的船夫在放歌。

“我是你的希望，米莉亚姆，整整一年了，人人都得靠希望往下过日子。你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另一个人吗？在这古巴岛上当然找不到了，没有人会来代替我的位置。”

“你这杂种，吉列尔莫。”

“随便你怎么想，你看着办吧。”

两人一句紧跟一句地说着。也许米莉亚姆最后用她表现力丰富的手臂做了某个不置可否的手势。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此刻沉默或暂停是必要的，给了谩骂者退路，不必收回谩骂也无须道歉就能示好。如果双方都有私心，说过的话就会像年幼的兄弟姐妹之间的争吵那样最后烟消云散，或者积攒着，等待以后再爆发。米莉亚姆想必在思忖。她想必在寻思着自己心里再清楚不过的事情，她也许已经思虑了无数遍，而且想法跟我一样——尽管我一点儿情况都不了解，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一无所知。我认为这个叫吉列尔莫的男人言之有理，并且掌握着主动权。米莉亚姆只能继续等待，想方设法逐渐成为对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可能受骗上当；她只能尽可能地少一些坚持，自然也不能再要求那位西班牙病妻暴毙而亡，后者对自己的外交官、做产业或做买卖的丈夫每次因生意或公务去哈瓦那旅行时的经历毫不知情。我想米莉亚姆有理由怀疑和抱怨：这是一场骗局，不存在那个所谓的西班牙太太，即使有的话，身体也无比健康。这位太太不知道，对于另一片大陆的一个陌生的混血女人来讲她是个垂死之人，对方在盼望她的死讯，说不定还在为她的死亡祈祷。更糟糕的是，由于意念和语言的感应，在世界的另一端，她的死期会提前或加速到来。

内容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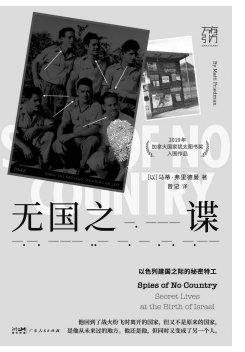
当代长篇小说经典杰作。以一位年轻男子的视角，讲述新婚的隐痛，以及对家族秘密的追寻探究。多年前，“我”的家族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女孩成年以后，蜜月旅行回来没过多久，她从餐桌上起身走进浴室，站到镜子前，解开衬衫，脱下胸罩，用她父亲的手枪枪口摸索心脏的位置。五分钟后，枪声响了。随着调查深入，一场死亡牵扯出另一场死亡，一段婚姻之下掩盖着另一段婚姻。尘封四十年的秘密逐渐向我显露，而父亲终于提起了他的往事……

作者简介

哈维尔·马里亚斯

西班牙著名作家、翻译家，1951年生于马德里。1979年因翻译《项狄传》获得西班牙国家翻译奖。1992年出版《如此苍白的心》，英译版于1997年获得IMPAC都柏林国际文学奖。另著有长篇小说《万灵》《明日战场上我要重压在你心头》，短篇小说集《不再有爱》等。马里亚斯曾被认为是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西班牙作家。2022年9月11日，马里亚斯在马德里的家中病逝。

最后一个故事



《无国之谍：以色列建国之际的秘密特工》
[以]马蒂·弗里德曼 著 曾记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3年2月

■内容简介

以色列的摩萨德，是与美国中情局、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英国军情六处齐名的世界四大情报机构之一。书中通过大量口述、笔录、回忆录和档案，作者提笔揭开了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中被掩盖的一角。

■作者简介

马蒂·弗里德曼

著名以色列裔记者、作家，曾任美联社记者和《纽约时报》专栏撰稿人。

把所有人从贝鲁特撤出还要花一段时间。而那名特工的死则是阿拉伯分部的最后一次重要事件。

从那件事之后，电文日志中明显透露出特工们的厌倦。亚库巴迫不及待要回家，但总部拒绝了他的要求；替补特工正在训练，但还没准备好。哈巴谷也想回去，但也收到了同样的回复。以撒说，他有某种伤病，希望在以色列接受治疗，但被告知他得在黎巴嫩寻求治疗。

总部日常要求他们提供有关叙利亚空军的信息，还有在黎巴嫩申请难民证明的方法，除此之外，日志中也有来自家人和朋友的消息。迷人的女战士米拉现已退伍，向哈巴谷表达她的爱和忠诚，她在等着他。1949年9月22日晚上10点，以撒得知，他的兄弟阿夫拉罕去了以色列，刚刚结婚。这让事情变得更糟。在战争中受苦是一回事，但战争现在已经结束，以色列开始有了生活，虽然是那种死里逃生的人所过的愤怒的生活。但这些却没有他们的份儿。他们不是专业间谍，并没有打算长时间做下去，也没有准备好生活在间谍身份总要应对的危险和枯燥当中。当然，红发人之死也迫使他们不得不直面自己承担的风险。

在跟随这些人回家之前，在贝鲁特还有最后一个故事，很值得讲述。

在“三个月亮”学校旁边的那条街上，间谍们经营的报刊亭边上有间小店面，有个亚美尼亚人在里面修理手表，另一家店是个鞋匠铺，还有一家是补轮胎的。生意不忙的时候，补轮胎的人经常过来聊天。他知道报刊亭里的人是来自巴勒斯坦的难民，因此一有什么消息就来告诉他们。如果碰上巴勒斯坦来的顾客，他有时也会把他们带去见见阿卜杜勒·卡里姆和易卜拉欣等人。

以撒还记得，有一天补轮胎的人带着一个人来到报刊亭。这个人穿了套简单的西装，看上去已然年迈，可能有70岁了，不过也说不准，那些年兵荒马乱，不少人都早早地弯腰驼背、行动迟缓了。和往常一样，以撒（阿卜杜勒·卡里姆）不等对方问自己，就抢先询问他来自哪里。那人说他来自海法，以撒就说自己来自雅法。补轮胎的人回到了他的店铺，留下难民们单独说话。

那人把他的故事告诉了以撒。他说，所有人都逃走了，他也跟着逃离了海法，现在住在难民营里。但这还不是故事的重点，还有别的事。老人有两个儿子。他们都是海法一家修车行的修车工，一个18岁，另一个20岁。战争开始的时候，犹太人把炸弹偷偷运到他们的车库里，炸弹爆炸时——

以撒当然知道这个故事，你也知道。我问以撒，老人是不是哭了。

“他没哭，”以撒说，“但他很伤心。”

以撒还能为这个人做些什么呢？他照例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并请求真主向凶手复仇。过了一会儿，这位丧子的父亲才蹒跚离去，以撒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在谈话过程中，我有几次想让以撒谈谈他怎么看待当年那个充满暴力的世界，这也是如今记者们常问的问题：你当时感觉如何？事后是否还会回想起来？他表现得很有礼貌，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对于他而言，只不过是现代人愚蠢的一种表现。公开地反省，说几句动人的话表示一下遗憾，这些都是后来冒出来的新玩意儿，不是当时阿拉伯分部的风格。